

哲学的应用与改革

武汉大学出版社

哲学的应用与改革

本书编辑组 编

责任编辑 戴老红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 珞珈山)

黄冈报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9.375印张 229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第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2279·11 定价:1.80元

ISBN 7-307-00128-4/B·2

编 者 的 话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形势的要求，由湖北省哲学学会、湖北省大型企业应用哲学研究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华东化工学院社会科学系、大连工学院社会科学系、武汉钢铁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中南财经大学、湖北大学、华中工学院哲学所、中共湖北省委党校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共同筹备组织，于1985年4月下旬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应用哲学学术讨论会”。会上收到论文、调查报告和研究资料共八十余篇。奉献给读者的这部《哲学的应用与改革》文集，就是从上述文稿中选编而成的。收入这个集子的文稿，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应用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应用哲学”的涵义、性质、对象、任务、方法和分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另一方面是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到实际工作（如管理工作、领导工作以及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等）中去，为改革和四化建设服务，作了深入的思考。这部文集，从形式上看，虽然不是专著的体例，但就它的内容来说，却有某些胜于专著的地方：各篇论文和调查报告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不仅象专著那样具有严谨的逻辑性和前后的连贯性，而且其见解不只是一家之言，而是众家之言，这对于推动“应用哲学”和哲学的应用的研究，是大有好处的。

本书编辑工作由湖北大型企业应用哲学研究会副会长齐金堂、汪世学，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雅涛，湖北省哲学学会秘书长

朱传荣四人担任。朱传荣同志并承担了编辑、出版本文集的组织工作。由于编者理论水平有限,对现实缺乏研究,加之编辑时间短促,因而在编辑工作中肯定存在不少缺点,诚恳欢迎读者、作者和与会者批评指正。

1985年6月

于武汉市

目 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改革·····	武汉大学	陶德麟 (1)
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哲学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	李秀林 (10)
应用哲学断想·····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李步楼 (39)
哲学应用与应用哲学·····	中南财经大学 郝侠君	朱书刚 (48)
关于应用哲学的几点认识·····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吴瑞泽 (62)
建立应用哲学势在必行·····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中共武钢委员会党校	杜云波 (71) 徐厚德
应用哲学的可能方向·····	华东化工学院	罗建平 (79)
关于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的 理论思考·····		郭晋平 (92)
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应用哲学 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欧阳康 (106)
哲学应用中的世界观与 方法论·····	中共桂林市委党校	邓维亮 (115)
改革的哲学与哲学的改革·····	武汉大学	朱传荣 (130)
如何正确地看待应用哲学·····	铁道部党校	张 磊 (142)
“同步改革”的哲学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	杨彦钧 (148)
认识武钢 发展武钢·····	武汉钢铁公司	郑云飞 (161)

辩证法的经营管理观——关于工业企业经营管理

中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第二汽车制造厂 汪 皓 (171)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领导科学……………武汉大学 雍 涛 陈祖华 (186)

农业技术论初探……………华中农学院 刘春仁 谭冬森 (202)

对技术的辩证思考……………都红岩 (214)

关于管理科学中的几个

认识论问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徐龙福 (226)

对投产后的现代化大工程的再认识

(摘要)……………武汉钢铁学院 张美彩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张步楼 (237)
武汉钢铁公司 齐金堂 徐厚德

试论我国钢铁企业发展中的技术进步与

管理体制改革的统一……………中共武钢党校 黄育德 刘爱兰 (248)

从系统分析浅议发展长江

航运……………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李光武 陈忠福 (262)

应用哲学讨论会综述……………中国人民大学 翁寒松 (269)

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研究

概况简介……………大连工学院 于 清 (276)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改革

陶德麟

现在各门学科都在研究如何为当前的改革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为改革服务，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我们哲学工作者尤其应该认真考虑。有的同志说哲学不象经济科学或技术科学那样可以计算出明显的“效益”，似乎不大好“服务”。我看不然。在某种意义上，哲学的“效益”倒可以说是最大的，它对我们各项工作的服务是最根本的。它虽然不能直接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但任何具体工作都离不开它。它是世界观、方法论，是一切实际工作的“代数学”。有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响导，就是有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问题，这对于工作的成败、工作成绩的大小、工作进展的迅速都是非同小可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抓住了用辩证唯物主义战胜主观主义的问题，革命能胜利吗？粉碎“四人帮”以后如果不是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克服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局面吗？这个“效益”还不大吗？可见，不存在哲学能不能为改革服务的问题，需要探讨的只是哲学怎样更有效地为改革服务的问题。要更好地为改革服务，我感到我们的哲学工作本身需要改革。因为我们的哲学工作虽然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成绩，但是从当前的状况来看还相当落后，还远远不能适应整个社会改革的需要。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其实不只是说哲学，还说到整个马克思主义，不过我们在这里只谈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遇到了困难。这指的是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说现代科学和现代实际生活提出了一系列过去没有提出过的问题，要求马克思主义作出回答，而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一方面是说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流派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它们的答回，它们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坚持的观点相矛盾，或者正在指名道姓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对它们作出有力的批驳。我个人不大赞成把前一种情况叫“挑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同科学、同实际生活血肉相连的，无所谓谁向谁“挑战”的问题。但是不管叫不叫“挑战”，科学和实际生活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问题总是事实。至于后一种情况当然是挑战。这两种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危言耸听，只不过我们在很长的时期里视而不见罢了。这件事是坏事还是好事？我个人认为是好事，而且是很好的事。凡是正在发展着的科学不可能不遇到现实提出的新问题，不可能不遇到困难。难道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在它们的发展史上遇到的困难还少吗？不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困难（甚至“危机”）推动着它们前进吗？一门科学如果不遇到困难，它的生命也就终结了。宗教是没有“困难”的，因为它从来不企图去科学地解释任何问题，根本不是科学，当然没有什么“困难”可言。有些适用界限已经历史地确定了的科学也不会在新问题面前遇到“困难”，因为人们并不要求它回答这些新问题。例如今天绝没有人要求牛顿力学去回答统一场论的问题，也绝不会因为它回答不了统一场论的问题而“攻击”它。现在人们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新的问题，并且有人因为它现在还回答得不够圆满而非难它，这恰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实践密切相关的、正在发展着的、有旺盛生命力的科学。它遇到了困难，正表明它处在大发展的前夜。这有什么

不好呢？“挑战”也好，“困难”也好，本身是丝毫没有有什么可怕之处的。可怕的是我们对这种已经存在的事实采取“不承认主义”，不采取行动去迎接“挑战”，去克服困难，去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情况是不是存在呢？我接触到的一部分从事哲学工作的“同行”们都认为是存在的。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很不满意，有一种焦急的心情，感到哲学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改革，是不可能适应整个社会改革的需要的。我们应该从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样几个大的方面来检查一下我们的工作的现状，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估计，从而下工夫改进我们的工作

先说面向四化。

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实际工作服务就是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群众，帮助群众正确地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这种说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有不同的要求。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条件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新的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状况和思维方式，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新自己的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需要观察和处理的问题也与过去（比如革命战争年代）大不相同，大量的问题过去根本不可能遇到，甚至不可能想到。要解决这些新的复杂问题就必须有更严密更系统的哲学工具。而这方面的历史特点都要求我们向群众宣传具有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讲过，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哲学都将改变自己的形式。不可否认，从本世纪初期到现在的八十多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又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不仅自然科学，而且整个人类的知识状况的改变确实是划时代的。可是我们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多少新的进展呢？恐怕很难说。我们现在向群众讲的东西，基本上（当然不好说全部）还是三十年代苏联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讲过的东西。不是说没有引用新的科学材料，但是用新的材料所论证的

观点基本上还是旧的，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推进。当年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弄成一个有条有理的体系，教育了好几代人（包括我们这些后学在内），这是极大的功劳，这个巨大的历史作用决不能抹杀，他们讲的许多东西直到今天也还有价值。这一点并没有疑问。但是历史毕竟是大踏步地前进了。如果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还是复述那时的东西，怎么能同时代的要求相称？以这样陈旧的内容怎么可能回答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种种新问题？又怎么能够有效地帮助成千上万的战斗在四化建设第一线的改革者们树立能适应现代化要求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例如讲辩证法，今天还完全按老的讲法行不行？要不要有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述形式？很值得考虑。国外有些对唯物辩证法本身并无敌意的学者（例如加拿大的Bange）批评我们讲的辩证法概念不精确，建议吸取现代逻辑的成果作重新表述。我个人觉得这种批评虽不见得全对，但有不少意见是可取的，我们不应该一概看作是“恶毒攻击”而加以拒绝。事实上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中也有不少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做了不少工作（例如英国的Cornforth，日本的岩崎允胤和宫原将平等人）。而我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我们对辩证法的许多讲法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黑格尔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思想，但是他的表述方式并不可取，有许多违反现代逻辑的错误，有许多缠夹不清、玄之又玄的古怪说法。可是我们往往不加分析地沿袭下来。比如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或动力，这本来是完全正确的辩证法原理；但他讲起来竟讲成可以容许逻辑矛盾，这就荒谬了。他大肆嘲笑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嘲笑 A 是 A 的公式，硬要把 A 是非 A 作为“辩证法”的公式同形式逻辑相对立。其实，如果承认 A 是非 A （用现代逻辑的公式表述，就是 $p \supset \neg p$ ），我们就可以“证明”任何假命题都是真的，全部演绎

推理就崩溃了，全部数学就崩溃了，全部科学就崩溃了。没有一个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人会认可这样荒谬的“公式”。我们讲辩证法的时候也强调了要把辩证矛盾同逻辑矛盾区别开来，并且引证列宁的话，说逻辑矛盾是不能允许的。但事实我们经常把逻辑矛盾当成辩证法来宣传。“既是又不是”——这种说法相当流行，说这是“辩证判断”。其实分析起来不过是把两个判断合成一句话来说而已。比如“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即“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又不是真老虎”）这句话其实就是把两个不同的判断合在一起说的：一个判断是“帝国主义从战术上看是真老虎”，一个判断是“帝国主义从战略上看不是真老虎”。这两个判断各自都没有逻辑矛盾，彼此也没有逻辑矛盾。合在一起说也不是不可以的，但不能把它解释成为一个判断，而且是同“非辩证判断”对立的“辩证判断”。如果我们在同一意义上断言A既是A又不是A，并说这是“辩证判断”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公然认可逻辑矛盾。把这样违反逻辑的“公式”向群众宣传，还说这是“高等逻辑”，我认为这不仅不能帮助群众树立科学的思维方法，反而会把人们的思想弄糊涂。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科学家们（包括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发现了逻辑矛盾（即悖论）就睡不着觉，认为不解决这个矛盾这个理论就要垮台，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找出路，也正是在找出路的过程中推进了理论；甚至建立了整套整套的新理论。而我们呢？见到了悖论不但不着急，反而高兴得很，说思维本来就是矛盾的，这恰好证明了矛盾的普遍性，是辩证法的胜利。于是我们就心安理得，不去解决这种逻辑矛盾了。结果人家在理论上前进了很远，我们还在原地。这怎么行？我认为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直到今天也还是正确的，它的内容、它的实质一点也没有被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所“驳倒”。但是它的表述形式、它的论证方式确实有许多是不符合现代人类的知识状况了，比如时空无限性的

原理、能动反映论的原理、必然与偶然的原理、因果关系的原理，等等，都不能还照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的讲法去讲了。还有许多问题我们至今还停留在过于一般的讲法上。比如认识论，按照现代科学发展的水平，它应有的内容比我们现在教科书里讲的内容不知道要丰富多少倍。如果我们只是年复一年地讲实践出真知、两个飞跃、无限循环往复等等，是远远不够用了。这些问题没有必要细说。总之，我们迫切需要有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的思维方式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则是不可能真正帮助正在处理现代化建设中各种复杂问题的人们提高分析能力的。

再说面向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被创立的第一天起本来就是面向世界的。它要向全世界的群众作宣传，要批判整个旧世界，要同全世界的敌对思潮作战，同时也要不断地吸取全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丰富和发展自己，而决不是脱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学说或宗派理论。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很奇怪，在很长的时期里我们把自己同中国以外的世界隔上了一道樊篱，把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了。不是说要“放眼世界”吗？可是多年来我们实行的却是“马克思主义闭眼”政策。我们自以为的高峰就在我们这里。至于世界各国的各种流派在搞些什么，别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做了些什么工作，我们是不屑一顾的。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在哪里写了书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恶毒的攻击（真正意义上的恶毒攻击），我们也不理睬，或者还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我们也喊要批判那批判那，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斗性，可是我们基本上是关起门来战斗，是不了解战斗对象的战斗，是无对手的战斗。我们在课堂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也捎带着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提到一些外国人或外国流派，有时还引出他们的一些话来批，而

且战斗进行得异常顺利，费不上几句就证明了那些东西无非是“荒谬绝伦”、“反动透顶”、“不值一驳”的“无耻谰言”，我们只要动一动小指头它们就立即“粉碎”了，我们每一次都是大获全胜。给听众的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手都是一些骗子、傻子、疯子。其实，我们对那些战斗对象是并不怎么了解的，简直可以说相当无知。我们之所以每战必胜，所向披靡，大概是因为对手并不在场。假如对手在场，他站起同我们辩论，我们有把握辩得过他吗？恐怕未必，至少我个人是不敢说这个大话的。这当然不是说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比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明，而是说我们对世界的情况太缺乏研究。多年来我们基本上同世界哲学界没有“对话”，基本上没有派出我们的代表到国际哲学讲坛上同人家一较短长。同我们的体育界比起来我们感到惭愧。在这方面苏联哲学界比我们强得多，他们很注意这个事，在哲学的各个分支里都有一批比较强的专家，在国际哲学讲坛上有发言权。我们作为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而且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大国，竟然在国际哲学讲坛上默不作声，这实在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不改变这种状况怎么行？现在已经开始改变了，但仅仅是开始，大量艰巨的工作还有待于我们长期地坚持不懈地去做。

再说面向未来。

面向四化和面向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面向未来，因为只有抓好了现在才能有光明的未来。但这里说的面向未来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说要直接考虑到、估计到未来的需要。就我们搞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的同志们来说，应该不仅考虑应该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搞得能适应当前的需要，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子孙后代的需要。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的前列，没有高度发达的理论思维是不行的，没有深刻的哲学思想是不行的。我们要使整个民族的哲学思维的水平站在世界的高峰上。这是极其光荣而又极其艰巨

的事业，没有若干代人的努力是不可做到的。但是我们从现在起就要一步一步地去做。这个工作是多方面的，比如要研究我国革命建设的丰富经验（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要研究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要研究新的技术革命，要研究中外历史遗产，要研究现代各种流派的哲学，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理论问题，要开拓新的领域，要加强哲学的普及工作，等等，这个清单可以开得很长。但是我觉得要做好任何方面的工作，关键还在于要弄清楚一系列原则性的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如何？对哲学的阶级性应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如何？如何对待经典著作？如何对待具体科学？如何对待唯心主义？如何对待现代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联系实际？如何开展百家争鸣？如何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恐怕毋庸讳言，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对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是有很多片面性的，总的说来是“左”的东西太多，形而上学的、简单化的东西太多。这些东西是束缚我们的枷锁，使我们眼光狭隘，思想闭塞，步履艰难。我只说其中的一点。我们为什么对近几十年来世界的各种哲学思潮知道得如此之少呢？这就与我们在上面说的某些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有关。有时候我们似乎相当自大，对外国的东西不屑一顾；而其实这自大里面又隐含着自卑，好象外国的东西一进来就会把我们吃掉似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那么容易“中毒”？那么经不起风吹雨打？鲁迅提倡“拿来主义”，这是合乎唯物辩证法的。他还说过，我们中国大凡强盛的朝代都是不怕外国的东西进来的，因为自信有能力消化它、利用它；而衰弱的朝代就老是怕别人把自己吃掉了，防得很紧。我们现在是一个蓬勃向上的社会主义大国，又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当然应该有比历史上任何强盛的朝代更宏大得无比的气魄，完全没有怕被别人吃掉的必要。当然，盲目崇拜西方学术的

倾向是必须坚决反对的，事实上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问题。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我个人觉得更大的问题倒是盲目拒斥，不敢接触。我不否认，由于多年的禁锢，一下开放起来会有些眼花缭乱，介绍和评价未必处处恰当，把糟粕当成精华的错误也会发生一些。但我们要相信自己通过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是能够分清良莠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怕中毒就不吃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看得远些。

（此文系作者在湖北省社联组织的“社会科学与改革”理论讨论上的发言记录稿）

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哲学思考

李秀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全力和加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的历史时期。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导下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里，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应当是从理论上回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新问题，对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这既是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的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性质的要求。

所谓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哲学思考，就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哲学研究的客体，运用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把握它的本质和规律，对它进行分析、论证、概括和总结，进而借助同其他各门科学的密切配合，探索它未来的发展，以此来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功能。其目的在于，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自觉发展，同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

这是一个连结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在这个问题上，单纯从理论到理论地空发议论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种“无米之炊”。有鉴于此，一九八四年五月到十月，我们分别在四川、湖北、山西、江苏等地作了一些实地调查，感触殊深，收益颇大。如果说学习理论是“开卷有益”的话，那末接触实际则是“迈步有益”。迈开你的双脚，走进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中去，眼前即有哲学通向现实生活的道路，经过思索，也会架起生

活反馈于哲学的桥梁。

一、反映时代精神

哲学思考的首要要求，是充分反映时代和时代精神。“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①。

什么是“时代”？什么是“时代精神”？这是科学历史观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可不可说，通常所谓“大势之所趋”，就通俗地表达了“时代”或“历史时代”的主要内容；通常所谓“人心之所向”，就通俗地表达了“时代精神”的主要内容。大势所趋是历史进程的客观潮流；这种客观趋势反映到人的主观世界中，体现在社会心理、社会意识中，就是时代精神。要对现代化建设进行哲学思考，就必须充分反映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当之无愧地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当今之世，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呈现在历史观视野中的，主要是两股潮流，一个是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的潮流，一个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这两股潮流汇合在一起，形成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这个时代的潮流。

（一）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潮流

这一潮流，托夫勒称作“第三次浪潮”，科图拉夫称作“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潮流的流向，奈斯比特认为将导致“信息社会”的建立，贝尔认为将导致“后工业社会”的出现。说法尽管不同，却都描述了一个共同的事实：以微电子学、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业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无论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无论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新技术革命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